

法拉奇作品

INTERVISTA CON LA STORIA
Oriana Fallaci

风云人物采访记 I 下

[意大利] 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嵇书佩 乐华 杨顺祥 译

译林出版社



风云人物采访记 I

[意大利] 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嵇书佩 乐华 杨顺祥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云人物采访记 .1 / (意) 法拉奇著; 嵇书佩, 乐华, 杨顺祥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7

(法拉奇作品)

ISBN 978-7-5447-5456-9

I. ①风… II. ①法… ②嵇… ③乐… ④杨… III. ①政治家—访问记—世界 IV. ①K8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90227号

Author : Oriana Fallaci

Title : INTERVISTA CON LA STORIA

Copyright © 1974-2012 RCS Libri S.p.A., Milan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257号

书 名 风云人物采访记 I
作 者 [意大利] 奥里亚娜·法拉奇
译 者 嵇书佩 乐华 杨顺祥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刘文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48
字 数 645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456-9
定 价 100.00元 (上、下册)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乔治·阿门多拉

乔治·阿门多拉1917年11月21日出生于罗马。1974年1月接受奥里亚娜采访后，他继续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任职，但是也培养了自己对写作的爱好，出版过重要的作品。1980年6月5日，因病在罗马逝世。他去世后几小时，他的法籍妻子热尔梅娜·勒科克因悲伤过度，相继离世。他们是在他流亡巴黎时相识的。

我想从他那里知道的事情很多。任何一个非共产党人想从一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那里知道的，自 1974 年以来的一切事情我都想知道：要是就离婚法举行公民投票，意共会采取什么态度；当时议论纷纷而又未必可行的历史性妥协的实质是什么；意共与社会党人之间，与那些认为意共精神不振并称意共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议会外的极左小组之间是什么关系；最后，还有它与苏联的关系和自由问题。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表现出独立于莫斯科？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它所说的不抛弃多元制？的确，30 年来他们几乎一直玩弄着民主的把戏，当反对派也当得不错，但是，要是进入政府参与掌权，他们还会这样干吗？这样干是他们的策略呢还是出于真心？贝林格基本上缄默不语，他当时羞于见人，不接受采访，需要 1976 年那样的大选才能看到他露面，与新闻界接触。如果想得到我所寻求的东西，那么，必须求助于别的人，这个人就是乔治·阿门多拉。因为实际上他是唯一的一个不缄口、不害怕回答最棘手的问题的人。

他作为人，作为一个要人，我尤其想了解他。我认为他是意大利最使人感兴趣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生平富有传奇色彩，难怪在一些很受欢迎的书里记载着他的故事。他是极伟大的自由党人乔瓦尼·阿门多拉和非凡的女杰埃娃·科恩的儿子，他出生于和成长于一个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家庭，因此，他是一名没有共产党先天特征的共产党人。20 岁以前，他也是一位自由党人，在他转变为共产党人之前，人们猜测他至多会参加“正义和自由运动”。他是贝内代托·克罗齐的学

生，也是加莱亚佐·齐亚诺^①的朋友。他与贾恩卡洛·巴叶塔、隆哥^②或斯科奇马罗^③这些人不能相提并论。无论从哪方面说，他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充满出人意料和离奇的事情。作为反法西斯战士，他战斗得不错，遭到过驱逐和流亡。他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参加了抵抗运动，不久便惹人注目地、令人痛心地完成抵抗运动领袖之一。此外，他还参加了拉塞腊大街的行动。为此，德国人制造了阿尔德阿蒂内惨案进行报复。^④从1940年到1945年期间，意共的根基是如此稳固以至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共产党，这一点也应归功于他。但是，他的观点和行动始终保持着明显的独立性。例如，他是唯一敢于违抗陶里亚蒂的人；他忠于斯大林，但也是最早意识到斯大林主义已经名誉扫地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因而意共实行非斯大林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有人讥讽他，称他为“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偶然的。可是，看起来他是个旧式的共产党人。他给人的印象是强硬、严肃和冷淡，这也许是由于他的外表：高大、魁梧的身材，常常面带怒容，像个农民的红润脸盘，军人式的短头发以及沉重、坚定的步伐。据说，他还爱发脾气。他讲话时喜欢用指关节敲桌子以加强语气，敲桌子时声音响得像枪声。

因此，当我采访他时，他的和蔼可亲使我十分惊讶。起初我当然以为这种和蔼可亲是矫揉造作，就像一位旧式教授在劝告一个笨学生，要他多学并学好一样。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印象是由于他那指关节敲桌

①加莱亚佐·齐亚诺 (Galeazzo Ciano, 1903—1944)，墨索里尼女婿，墨索里尼政府外交大臣。1943年参与推翻墨索里尼的活动，1944年被墨索里尼以叛国罪处决。

②路易吉·隆哥 (Luigi Longo, 1900—1980)，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64年陶里亚蒂逝世后，接任意共中央总书记。1972年当选意共中央主席。

③毛罗·斯科奇马罗 (Mauro Scoccimarro, 1895—1972)，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曾任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执委。二战中在罗马领导意共武装开展地下抵抗运动，先后被选为意共中央委员和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二战后历选为众议员、参议员和参议院副议长。

④1944年3月24日，罗马的“爱国行动小组”在拉塞腊大街闹市区袭击了纳粹德国的一个纵队，33名德军士兵丧生。事后，德军宣称一个德国人的命要用十个意大利人来偿还，在罗马郊外阿尔德阿蒂内的沟坑里屠杀了335名意大利人。

子的声音和强有力的训斥人的声音，他说话时往往把嗓门提高到会使人惊跳起来。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这只是他的表面举止，他实际上是和蔼可亲的。甚至在感情激动时，他依然显得颇有教养、彬彬有礼。我的提问没有一次使他发怒，他也从未以沉默或以外交辞令来回避我的任何提问。对于任何挑衅性的和蛮横的提问，他回答时总是耐心地进行说理，看来教条并没有束缚住他或使他变得僵化。“你们共产党人令人讨厌……”“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总是摆出那副气呼呼的、阴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气。”“是的，是的。”关于这个细节值得多写几笔，因为那时意大利共产党人有一种恶习，在同一个非共产党人讲话时，或用嘲讽的口气，或表现出一种慷慨的迁就，似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既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又没有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笨蛋。嘲讽时而变成蔑视，迁就又变成近乎目中无人的傲慢，因而常常令人感到生气，决意不跟他们保持任何关系。当然，这个缺点至今并未完全消失，在基层仍很严重。我的看法是，越是无知的共产党员，越自以为是，在对待政敌时气量越狭窄。诚然，今天在他们的领导人中这种现象已难以找到，但重要的是阿门多拉在那时就已经与其他领导人不同，至少在跟我接触时从没有犯他的同志们的典型错误，尽管谈话的时间很长，前后三次，将近六小时。这本来是有可能使他露出真相的。

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我毫不犹豫地称它为友谊，尽管这种友谊未经过精心培育。后来由于别的原因，我们之间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在我采访他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刚刚 38 岁的女儿正病得厉害，数月后便与世长辞了。我知道他对此悲痛万分，便写信安慰他。他给我写了一封极好的、令人忧伤的回信。当我们失去心爱的人时，总觉得自己没有为他做足够的事，这是人之常情。正是这种由于工作而未能好好照顾自己女儿的内疚使他心绪不宁，当他知道我也处在母亲身患不治之症的悲剧之中时，便告诫我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在信中写道：“对为了去布鲁塞尔而少陪她一小时的悔恨会使你受不了。”这句话像个噩梦久久萦回在我的脑海中。总有一天我要告诉阿门

多拉它对我多么有用！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亲切的事。我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问世了。我给他寄了一本。他给我写了第二封信，告诉我在读这本书时他流泪了。因为他在主人公——一个等待孩子出生而又失去孩子的妇女身上看到了自己，而在孩子身上，甚至在胚胎中看到了他的女儿。他在信中写道，也许更多的人认为那本书是一首对怀疑、堕胎或爱的颂歌，而他认为是一本叙述死亡和痛苦的书。他感到有必要安慰我，因为他深信我已尝到和明白了什么叫痛苦。这次是我读他的信时流泪了。在这位粗暴的、肤色红润、冷若冰霜的男子汉身上却有着近似女性的温柔。

只用一个章节来谈意共问题即使以极快的速度也不可能保证完整。尤其所涉及的某些问题部分已成为历史或已解决。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人，人们要说的事情太多了，对于他们的疑问也是无穷无尽的。至于乔治·阿门多拉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值得谈的事情要比1974年初那次谈话中所涉及的多得多。但为了遵守我的诺言，即我的采访记应如实反映采访时发生的事情，我在发表这次谈话时也不考虑那些在那以后已发生变化，或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再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篇关于意大利共产主义的采访记，而是关于某个人的一幅画像，尽管在政治上我跟此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但我愿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再次与他并肩战斗。下面是我们谈话的正文。谈话是从阿门多拉当时刚刚出版的书《从米兰寄来的信件》开始的。我又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坐在一张写字桌前，我坐在他的对面。他的办公室挂满了名画，但没有一张宣传画，也没有列宁和马克思的肖像。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首先，祝贺您，阿门多拉议员阁下，我读了您的书，竟没有感到厌烦！对不起，唉，你们共产党人通常是那么令人讨厌，你们的话是那么杂乱无章，令人难以忍受。读你们的书或叫你们讲话的人没有不打哈欠的……

乔治·阿门多拉（以下简称“阿”）：我知道。我们经常受到这样

的指责，例如，陶里亚蒂、隆哥都受到过。严肃性跟纪律一样，是我们党的一个特征，而严肃性包含着乏味。当然，在我们当中有的人更惹人讨厌，而有的人稍好一些。可是……我也曾经惹人讨厌过。多年来，我常到意大利的街头广场去发表非常令人讨厌的演讲，两小时的讲话里充满了数字和经济概念……为了避免讲错，事先我都拟出讲稿，仔细修改，在演讲前充分地预习……严肃性像个金箍紧紧地束缚着我，使我成了个“瘸子”，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撂下这根“拐杖”，较随意地讲话。您知道吗？这是不容易的，需要成熟和自信，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谁代表它讲话都会感到责任的重大。由于纪律性加上怕犯错误，使你存有戒心，担心讲话讲出了格或讲得不好，这就束缚着你，压抑着你，使你窒息……对我那本书，我的同志们原来以为不会有什么趣味，但读了它以后，他们既惊奇又高兴地对我说：“简直像读一本侦探小说！”这话使我高兴。显然，我们也能打破冰窖，并运用潜在其中的、人人皆有的财富。请相信，我们是有这种财富的。

法：尽管冰窖中存在这种财富，但你们总也摆脱不了神甫特有的那种严峻。你们总是摆着一副气呼呼的、阴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气……就像一个神甫对那些不信存在天堂和地狱的人流露着憎恨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呢？

阿：嗯，是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尽管也有例外。例如，迪维托里奥^①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像迪维托里奥了。贾恩卡洛·巴叶塔性格外露，敏捷、活跃。我们并不是冷漠的人，知道吗？我们是充满激情的人。我曾经开列了一份名单，有关死于发表演讲之后出现的心肌梗塞的同志，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名单：陶里亚蒂、迪维托里奥、阿利卡塔、罗马尼奥利、格列科……我们有大批领导人死于激情，死于工作和激情。

法：阿门多拉，开始我的采访吧！随便谈，不要受金箍的束缚，也

^①朱塞佩·迪维托里奥 (Giuseppe Di Vittorio, 1892—1957)，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二战后担任意大利总工会总书记。

不要担心七零八落。我们就从您与隆哥正在进行的历史性争论开始。这次争论十分有趣，因为两个共产党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吵嘴，这还是第一次。这件事就像听到您在1943年曾反抗陶里亚蒂一样使人吃惊。

阿：请注意，作为个人，我跟陶里亚蒂很合得来。我一直是陶里亚蒂的崇拜者。可是当1943年底我们收到那封无线电报，命令我们与巴多利奥^①合作时，我坚决不执行。我的回答是断然的：“这是个建议，仅仅是个建议而已。我们就是这样对待它的。陶里亚蒂在莫斯科不可能判明我们所处的境况，也不可能了解别人的反应，例如社会党人与行动党人的反应。他是党的领袖，这是事实。但是他只有在回到意大利时，才能执行党的领导职务；只要他不在意大利，人们就不能接受他的领导，不能接受远距离的领导。领导应该在这里。”甚至在后来他回来时，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他笑了，并对我说：“你有道理。”陶里亚蒂总是说别人有理。

法：但这次您确实有理。

阿：确实，我完全有理。事实上当时这样想的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在罗马的人都反对那份电报。斯科奇马罗是一位教授，有点天真，他反对是出于他那常常表现出来的刻板的教条；我反对是由于政治原因……您看，在9月8日以前，我始终是一个最倾向于与巴多利奥接触的人。我在许多事情上批评他，但不愿与他中断关系。巴多利奥代表着一种力量，民族解放委员会^②的其他一些成员是倾向于它的。巴多利奥手中掌握着那些被流放和监禁的同志的命运……当时我们最优秀的的朋友或遭到流放或被监禁，例如巴叶塔，还有我的兄弟彼得罗。我

①彼得罗·巴多利奥(Pietro Badoglio, 1871—1956), 意大利陆军元帅。曾任总参谋长、利比亚总督、侵埃(塞俄比亚)意军总司令、埃塞俄比亚总督。1943年7月参加推翻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的政变，出任新政府总理。同年9月宣布无条件投降。

②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意大利反法西斯各政党的联合领导机构。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行动党、天主教民主党等政党在罗马成立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博诺米任主席，领导人民展开反对德国占领军和墨索里尼傀儡政权的斗争。意大利光复后逐渐解体。

打算营救他们，为此甚至设想在停战以后与巴多利奥一起组织政府。可是9月8日那天，那些人全部逃跑了。罗阿塔^①手下的人四处逃窜，乱成一团……您不了解那时发生的事。当我到劳资组合部找皮卡尔迪时，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可怜的皮卡尔迪。我们感到被人触犯了，受到了欺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起初，巴多利奥给我们作出了一大堆保证，后来却突然抛弃了我们，逃跑时什么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他要是想把国王带到南方去，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呢？为什么不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像个样子呢？整个罗马地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讨厌这种做法，采取了反巴多利奥的态度。天主教民主党人反对巴多利奥，社会党人和行动党人的反对尤其激烈。我不愿意与行动党、与佩尔蒂尼^②、与南尼失去联系，我愿意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收到了陶里亚蒂的那份电报。显然，我作了我应该作出的反应。

法：是的。但到1944年您就改变了想法。您为什么改变得那么快？为什么前后如此不一致？

阿：请注意，有的人总是希望前后一致。可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党同样如此。党的路线不是像一个完整的鸡蛋那样诞生的，它在形成以前要经过一系列的修改。我也曾经偏离过航道，走过弯路……发生过两件事。第一，在行动党人和社会党人中曾形成一个最高纲领派，他们竭力反对巴多利奥，拒绝同秘密的保皇党人接触。这个派别的首领是安德烈奥尼。他甚至说：“让我们把将军和保守党人消灭掉。目前打德国人跟我們有什么关系？明天我们要反对的正是那些将军和保守党人。”我断然拒绝这种立场。当时在罗马有许多军官和士兵是真心实意反对德国人的，为什么要放弃与他们结盟呢？再说，领导保皇党人的是蒙泰泽莫洛将军，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后来被枪杀在阿尔德阿蒂内土坑中了。我同他一起组织过几次破坏活动，其中一次在圣诞夜，

^① 马里奥·罗阿塔 (Mario Roatta, 1887—1968)，意大利将领，曾任军事情报处首脑，陆军总参谋长。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逃离罗马，11月被巴多利奥解职。

^② 桑德罗·佩尔蒂尼 (Sandro Pertini, 1896—1990)，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1978—1985年任意大利总统。

炸了罗马—卡西诺铁路线上的一列火车。您要知道，一般来说，社会党人是过左的。

法：过左吗？

阿：是的。1944年2月，南尼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切权力归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章。那篇文章没有任何论据，只是最高纲领派的宣传，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翻版。事实上，民族解放委员会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意识到过分地往左拉绳子会分裂民族解放委员会。于是，我通过斯科奇马罗做工作，想弥合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但是比起我来，斯科奇马罗跟社会党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争论……简单说来，1944年3月我开始改变主意，当博诺米^①向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辞职时，我的危机达到了顶点。那天，我们正在拉塞腊大街进行破坏活动，也是那天，我重新考虑了陶里亚蒂的电报。

法：隆哥在引证1944年5月写的一封信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您，指责您否认抗拒陶里亚蒂，并且把那次抗拒的全部责任推给斯科奇马罗。他称您为“野心家、变色龙”。

阿：隆哥说了一句更为严重的话。他说：“你是雅各布式的人物。”雅各布·贝尔蒂是一位同志，因狡猾、推卸责任而受到批评。我对隆哥的话非常恼火。我对他嚷道：“不，你不应该这样说。”但是那次争吵不是书面的而是口头的。隆哥的那封信我从没有看到过。我猜想是，信到罗马时我已到米兰去了。5月7日我到达米兰，与隆哥的会见开始是很亲切的，又是接吻，又是拥抱等等。可是很快就争吵起来，因为他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品德上批评我。他指责我多变，不只是因为 I 改变了立场，而且根据米兰同志的看法，我改变立场是出于野心。多变是真的，我并不否认自己改变了立场，但我认为指责我出于野心是对我的侮辱。关于与巴多利奥合作的必要性，隆哥一直同意陶里亚

^①伊瓦诺埃·博诺米 (Ivanoe Bonomi, 1873—1951)，意大利政治家。曾三次出任意大利总理。

蒂的意见。但是，隆哥待在北方，而北方对巴多利奥并不太感到失望。此外，北方还面临一个现实问题，要与一支来自法国并正向巴多利奥求助的武装力量的主力部队接触。这是一支无论装备或经费都极为充足的部队。

法：传说您与隆哥老是水火不相容，是这样吗？

阿：不，只是在那个时期，时间也不长。经过一番畅所欲言的交谈以后，我、隆哥和塞基亚便很快在一起工作了，我成了隆哥的得力助手。自从1931年我到达巴黎以来，隆哥一直是我的偶像。他是起决定作用的人物，甚至有人说发生转折是出于隆哥的意愿，连陶里亚蒂也接受这样的转折。尽管当时我22岁，而他30岁，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亲热的。我跟陶里亚蒂也是一见如故。我去巴黎时，原以为隆哥和陶里亚蒂是两个可怕的人物，可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平易近人。我在巴黎时经常要挨饿，因此常到隆哥家吃面食，而到陶里亚蒂家吃米饭。请注意，我还要指出，米兰的争论与其说是隆哥和阿门多拉之争，还不如说是隆哥和斯科奇马罗之争。那次是我提高嗓门，而不是隆哥，因为他有皮埃蒙特人的好脾气，跟陶里亚蒂一样，他从不提高嗓门。是我的脾气不好，而不是隆哥。我和隆哥之间的关系即使在解放后也一直是很好的。在开发南方的斗争中，我不是求助于隆哥吗？

法：是的，但听说您指责他“把酒倒在菜汤里，弄得乱七八糟”。人们认为缺乏互相理解是由于你们出身不同，您的出身更加接近资产阶级，而隆哥更接近无产阶级。

阿：胡说八道。隆哥从未在菜汤里掺酒，我也从未这样指责过他，而是隆哥讲述过他的祖父母在菜汤里掺酒的事，而且也没有把汤搞得乱七八糟，而是一种汤的喝法。我与隆哥在饮食方面的唯一不同是：我喜欢面食，因为我是生活在罗马的那不勒斯人；而他喜欢米饭，因为他是都灵人。至于有人想把我说成是贵族，隆哥是无产者，那是错误的。我们两人都是资产阶级出身。我是罗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他是皮埃蒙特的小资产阶级商人出身。是的，他的家庭原先务

农，但后来他的父亲迁至都灵，开了一家酒店。我与隆哥不同之处是，我的青年时代更加美好，加入共产党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参加了许多体育运动，尽情娱乐。从政治上说，我来自自由党。而隆哥从17岁起就是共产党员了。

法：好吧，好吧，我们不讲隆哥了，讲陶里亚蒂吧！您的那次抗拒，是不是也有点因为对陶里亚蒂不在意大利冒生命危险感到不满？

阿：不……绝不是这个原因。不幸的人被阻在莫斯科，怎能参加意大利的抵抗运动呢？我们参加了抵抗运动，因为我们能从法国回来，在政治上是幸运的。陶里亚蒂在法国被捕并被判刑，1940年又被送往莫斯科，因为那时还有共产国际。问题不是我们在冒生命危险，而陶里亚蒂不在冒生命危险。战争期间莫斯科不是指挥所。当然也不能说陶里亚蒂缺乏勇气。他的勇气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生理上的。在西班牙战争中，他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这难道不能反映他的勇气吗？请注意，我对陶里亚蒂的批评只涉及他在不了解意大利的现实情况下要从莫斯科领导党。我和他是真正的朋友。

法：然而，我听说您与陶里亚蒂之间发生过激烈冲突。我还读过他的一次讲话，他指责您是个讲私情而不讲原则的人。

阿：不，不……陶里亚蒂是一个十分有礼貌的人。他对人越严厉时，越有礼貌。他从不辱骂我，因为他极有自制力。请让我告诉您，陶里亚蒂是怎样表现的。在1962年的党代会上，我做了一个赫鲁晓夫式的发言。陶里亚蒂不赞同再责难斯大林，便冷冷地说：“我要对你作出回答。”可是，下面就是他的回答：“讨论太受感情支配了。例如，阿门多拉同志表现出他并未很好地理解苏联。也许他的见识太狭窄了，也许他旅行的机会太少了，今后有必要让他更多地出去旅行。”陶里亚蒂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从来不大声叫嚷，也不辱骂人。跟他在一起时遇到的唯一麻烦是难以冲破他的腼腆的障碍，他总是同我们保持距离。对斯大林的某些攻击使他恼怒是因为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法：对不起，阿门多拉，您是否也曾是个十足的斯大林分子？

阿：是的，是的，啊，是的。看到西方民主对待希特勒的胜利所持的态度，怎能使我不成为斯大林分子呢？1937年我抵达巴黎时，法兰西共和国腐败至极。只要自己能活命，资产阶级准备竭尽全力与人民政权为敌。他们就像举着长柄平底锅高喊反对阿连德^①的智利妇女一样。在一片混乱面前，只有斯大林执行雅各宾式的纪律进行战斗。实际上，革命都以恐怖手段进行自卫，难道法国革命不以恐怖手段进行自卫吗？难道它不吃掉自己的子女吗？斯大林的冷酷无情几乎使我们感到有了保障。是的，我曾经是一个极端的斯大林分子。当时我把德苏条约也看成是为了推迟对俄国的战争而进行的暂时妥协。直到战争结束，我始终是斯大林分子。战争一结束，我的疑问油然而生，一方面是由于划分势力范围引起的，同时，我认为苏联人民的成熟已达到了可以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束缚的程度……之后，二十大进一步解放了我的思想。

法：二十大是否也把您从苏联的长期诱惑中解放了出来？

阿：我认为没有苏联的力量世界早就完蛋了。有人说：“为了避免大国间达成协议，我们愿意欧洲独立。”说这种话的人使我感到可笑。幸好大国之间达成了协议，否则，靠我们欧洲人能制约苏联和美国吗？尼克松决定实行美元贬值就使意大利的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恶果。观察今天的世界不能脱离现实。讲上述那些话的人会说：两个大国之间的协议是制约我们的！可是让炸弹制约我们要比让协议制约我们坏得多！我不知道，在国际社会没有得到两个大国协议的保证的情况下，欧洲怎么能生存。欧洲是有它自己的作用的，但这种作用不是去同美国和苏联竞争的第三个大国的作用，此外，欧洲经济不是建立在军费开支的基础上。要是我们去建造萨姆导弹和原子弹，我们就会倒霉！

法：啊！您确实不相信欧洲联合。

阿：欧洲联合对我来说也不是乌托邦，但我认为只有文化、科学、

^① 萨尔瓦多·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 1908—1973)，智利社会党领导人。1970年当选智利总统，就职后开始推行被称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改革。1973年死于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

贸易方面的意义，而没有军事方面的意义。欧洲是参差不齐的。欧洲在历史上有过分裂，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只能从发挥她的思想宝库出发，别忘记世界是建立在欧洲的思想基础上的，应据此去寻求谅解。我再重复一遍：欧洲只能起促进和平的作用而不能同两个超级大国敌对。中立的政策适合于欧洲。

法：我不想再讨论下去了。我们扯得太远了，应该谈谈今天的意大利，谈谈历史性妥协和那些离我们更近的事情。但是首先我想简单谈一下您，阿门多拉，因为我认为这有助于了解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您是出身自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员……

阿：是的。但不应对我所生活的那个意大利的旧世界有所误解。那个世界是很严厉和严肃的，而不是轻浮的。我经常向那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作解释。我说：“请注意，其他人不都是无赖，他们是一些可以与之接触，而且也应该与之接触的人。”我还要告诉您，我把我的自由派经验和我对其他人的了解，例如我对贝内代托·克罗齐的怀念带到党内是件好事。当有人问我克罗齐是否对我起过指引作用时，我的回答是：“是的，但不是思想方面的指引。他是我生活和工作的榜样。”克罗齐住在修道院里，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早晨六点开始工作直到下午一点，这是他的午餐时间，有时我陪伴他去散步，然后他又投入工作。他对人朴直、亲切，但毫不温柔。一天我向他借一本书，他回答说：“不，您想读的话，请到这里来读。我的图书馆供您使用。”我从陶里亚蒂身上看到了克罗齐那种有节制的严厉，并发现他对研究克罗齐极感兴趣。陶里亚蒂如果看到我们不读书或只是装模作样地读书，他也要发脾气的。而我喜欢严肃的人。

法：那么您怎么会跟加莱亚佐·齐亚诺那样友好？

阿：我和加莱亚佐对戏剧有共同的爱好。当时，皮兰德娄^①红极一

^①路易吉·皮兰德娄 (Luigi Pirandello, 1867—1936)，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开拓者。193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时，我们这些小伙子对马尔科·普拉加^①那样的资产阶级旧式戏剧总是喝倒彩。加莱亚佐常为《国家报》写戏剧评论。我不记得是给哪个剧本喝了倒彩后而第一次被捕。我在狱中认识了加莱亚佐，后来我们跟其他几位评论家一起被释放。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因为他是那么活跃，那么聪明，也许聪明里渗透着玩世不恭，而这种玩世不恭限制了他的聪明……一天，我对加莱亚佐说：“事实上，我们想的是同样的事，为什么您不反对法西斯？”他说：“如果我是傻子，我就会反对。你是一位反法西斯领导人的儿子，而我是众议院议长科斯坦佐·齐亚诺的儿子。难道要我抛弃我的锦绣前程吗？”当他被法西斯分子枪杀时，我曾想起了他的这些话。有时玩世不恭似乎会给人带来好处，实际上坚持自己的理想才更安全。从我被流放起，我就中断了与加莱亚佐的友谊。1937年我结束流放回到罗马时，他想见我。当时他已当上了部长。我托人捎话对他说，不可能见面。他坚持说：“你来，我很愿意知道你对事情的看法。”我坚持不去，不过，我是强制自己这样做的。其实，人的内心往往跟外表不一致，对法西斯主义也应该深入地了解它。我们总是把法西斯主义看成铁板一块，忘记了每一个政权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

法：阿门多拉，您的意思是什么？

阿：我的意思是，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政权，各种不同的力量都在其中起作用，有代表君主制和大金融集团的保守力量，也有代表民众派别和工会的力量。这必然导致其内部发生斗争，这种斗争的确是一个政权内部的各种力量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36年即战胜埃塞俄比亚为止，墨索里尼一直控制着这个政权。不说明这一点，就不能解释1943年意大利发生的事情与德国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不同。另一点要说明的是，法西斯主义镇压行动也是多变的。开始几年施行了残忍的暴力，我的父亲就在当时惨遭杀害。继而实行有节制的镇压，伴之以诱骗、收买的手法。从1926年至1943年，法西

^①马尔科·普拉加 (Marco Praga, 1862—1929)，意大利剧作家。